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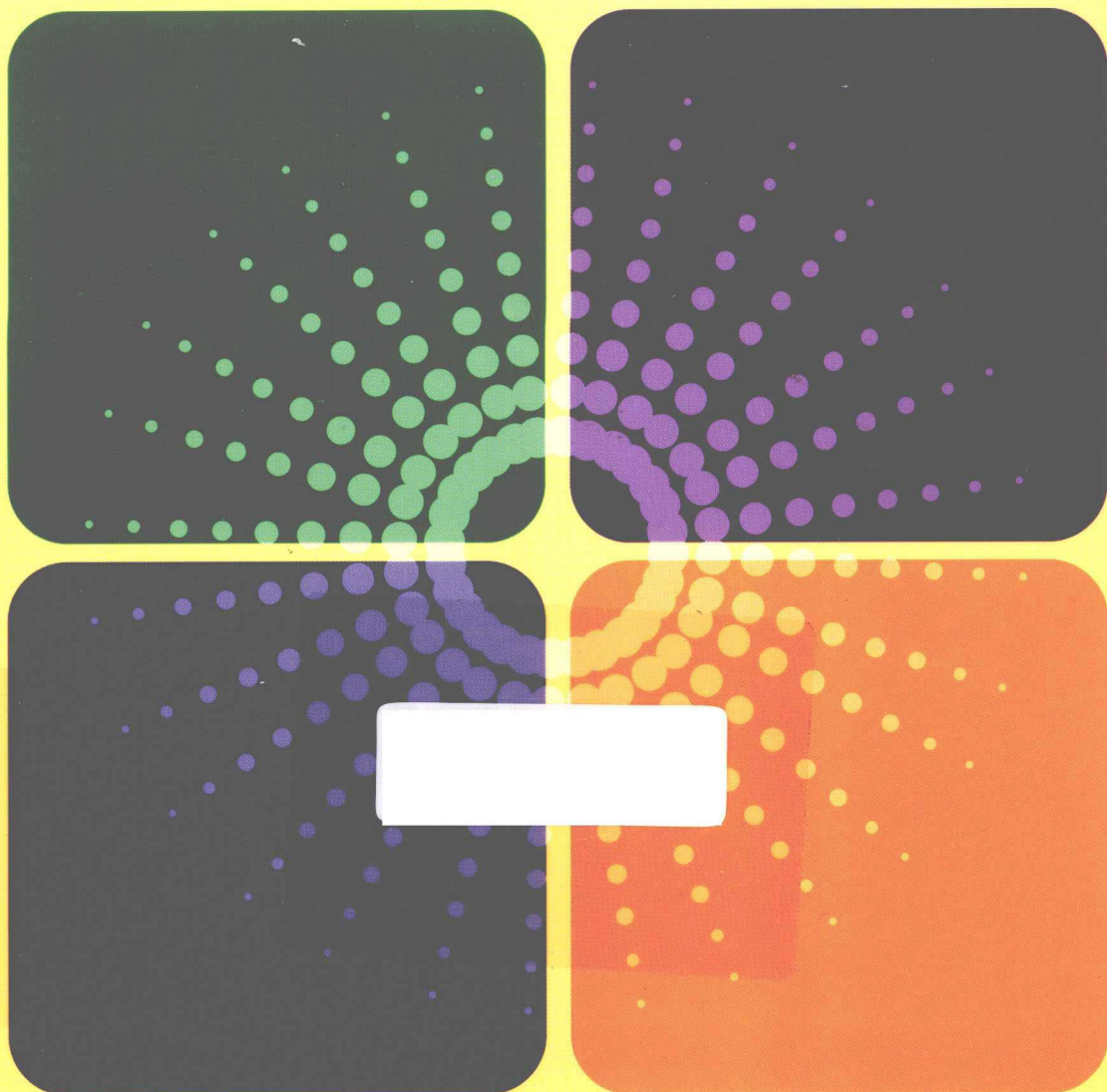


竞攀系列

上海市高校085内涵发展专业建设资助项目

重估中国体育传播的文化价值

路云亭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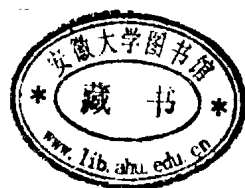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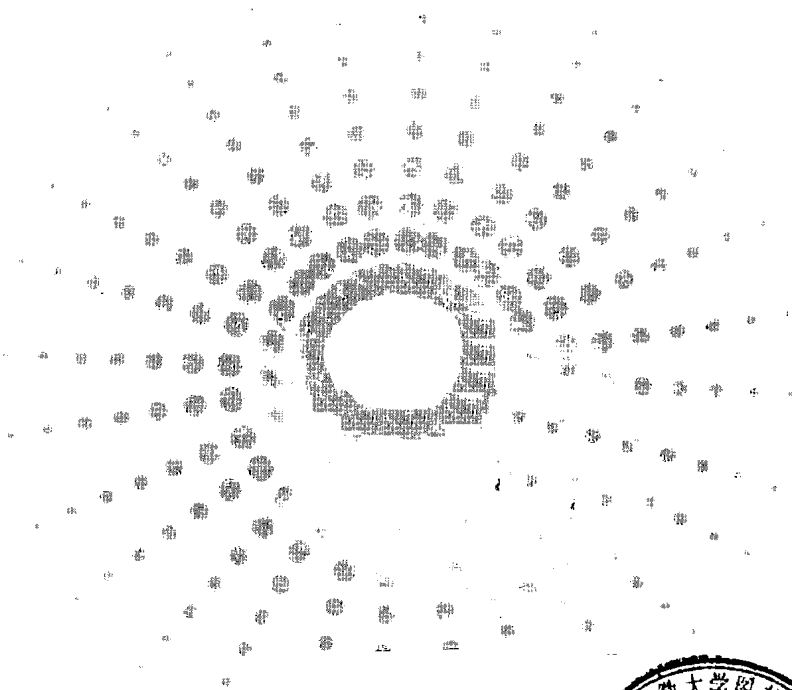


竞攀系列

上海市高校085内涵发展专业建设资助项目

重估中国体育传播的文化价值

路云亭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估中国体育传播的文化价值/路云亭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3
(竞攀系列)
ISBN 978-7-309-09428-2

I. 重… II. 路… III. 体育-传播学-文化价值 IV. G8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9038 号

重估中国体育传播的文化价值

路云亭 著

责任编辑/宫建平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 字数 277 千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428-2/G·1156

定价: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在现代文明史上,竞技体育无疑是文明大家族中重要的一员。由于电台、电视以及网络的普及,多姿多彩的现代竞技体育不再为少数人独享,而迅速变成了一种大众文化,进入了千家万户。时至今日,大量有关体育的信息、知识、观念已然深入人心,甚至已达一种人人皆言体育的程度。由于体育传播力度的强化,有关体育、运动、健身、偶像、明星等一系列和体育文化相关的理念不断得以普及,并带动起一种文化变革的潮流。很多人已经将体育看成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文化品种,体育在传媒力量的推动下逐渐成为一种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准。现实生活中时常见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是否具备现代意识竟以懂得多少竞技体育知识为部分依据。以竞技体育为代表的体育类型同样呈现出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文化功能。

竞技体育具有情绪和情感宣泄功能。从竞技体育所具有的娱乐价值来看,其内涵主要是指宣泄作用。竞技体育的每个欣赏者并不满足于从激烈、动人的人体对抗中去获得一定的美感,从而体验一次像观摩电影、戏剧一样的陶醉感,而更重要的是每个观众将民族意识、地域意识以及个人意识作为出发点,去寻求一种肌肉动作以及多变的胜与负排列次序的双重刺激。进而通过这种紧张后的松弛,胜负排列导致的狂欢与悲愤的感觉,去宣泄过剩精力,借以重塑心理秩序。当然,宣泄是一种精神元素的重组现象,其中不乏破坏、扬弃、重塑、再造等因素。社会生活中的暴力事件已为现代人所厌弃,亦为道德和法律所制约。但是,竞技运动中所蕴含的暴力因素却是正当、公平、良性、无害性的暴力对抗,其积极的价值并不在于可以杜绝社会暴力行为,而在于迫使大量不良、无序、盲目的暴力现象得以转移、消解、散发,最大限度地防止暴力现象在其他领域蔓延,从而在整体上降低社会极端现象的发生的概率,积极疏导社会群体的不良情绪。

电视画面中的竞技体育镜像显然要比竞技场上的竞技运动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力,竞技体育是一种展示人类原始感性力量的文化品类,不同水平的竞技体育都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医疗功用,竞技体育所蕴含的身体做功内涵一直具有体现人类潜能的文化价值。以电视体育观众为主体的观众群面对竞技表演之时,同时也在观照、体验、激发自身的潜能。观众通过迷恋、热爱、崇拜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可以遮蔽、掩盖或忘却自身生理潜能上的相对弱化的势能,以求替代式地证明自己的生存价值,并最终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与安宁。因此,竞技体育是现代社会的心理治疗的良药。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良药对一些不良心理的患者具有一定的疗效,其中对意志薄弱者、神经敏感者、心理变态者之类的患者,其潜移默化的治疗效果更显得强烈。大而言之,竞技体育对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也有同样的意义。大凡综合国力尚未企及强势的国家,往往更急欲在竞技体育的领域寻觅突破口,借以显示自身竞争力的强大,驱除弱国国民的自卑感与弱小感。这也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或在历史上遭受过战争或内乱创伤的国家热衷于竞技体育的原动力。

竞技体育还有补偿竞争意识的功能。竞争意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素质,它是人类生命力的根本体现,也是人类自身生存能力的标志。当然,竞争是一种复合性生命能力,是人和其他生物共有的本能,而人类生存的原始动力,它并不单指体育,而有多元内涵。然而,社会或个体的多元竞争力受到长期压抑,其竞争欲望必然以另一种变异的形式表现出来。狂热地标榜金牌主义,膨胀式地优先发展竞技体育,正反映了个体或社会在多元竞争力上的社会与文化偏移现象。这种竞赛的目的,已经不是真正的个体或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标志,而是民族精神荡涤、移位、毁坏、缺失后的治疗性、安抚性和重建性求证程序。

大凡极端重视竞技体育成绩的国家,大多具有国家性创伤记忆,而那些始终维持强大国力、内部机制健全的国度,时常会表现出对待金牌理性而淡然的态度。中国也一样,无法脱离现实文化发展阶段而获得突飞猛进式的飞跃,无论其他国家处在何等形态,中国人一直生活在金牌主义统治的世界,国人在这样的大时代无法也无需秉持一种对金牌的超然态度。中国人总有一天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淡化奥运会或其他的体育锦标,恢复到对体育竞技现象应有的淡然状态之中。但是,那时的中国人肯定是经历过集体性心理治疗后的健康的中国人,具有更为真实的现代人的情怀和素质。无论如何,中国的竞技体育及其宏大的传播工具仍然是群体性心理疗伤之器具,国人中仍不乏处于治疗集体性心理创伤程序中的那些人。对待锦标所秉持的超然态度或许是一种高尚的处事态度,但中国不必幻想超越任何无法超越的历史发展阶段。茫然的大跃进不如韧性地守望现实,中国庞大的体育竞争者和传播者队伍已然在执行一种简单的任务,以其依据客观规律行事,方为正确与理性之道路。

路云亭

2013年1月

目录

序言	001
前言	001
第一章 体育传播的权力播散	001
第一节 体育传播的启蒙力量	001
第二节 体育在影像时代的权力承续	007
第三节 策动中国体育传播品格的国家体育总局	015
第四节 体育传播的宗教学本性	024
第二章 体育传播展示出的民族性	033
第一节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民间性考量	033
第二节 北京奥运会会歌的音乐性失位现象	040
第三节 中国体育赛事密集现象的文化诠释	048
第三章 电视体育评论的实验性突破	052
第一节 中国教育电视台《体育评书》的民俗化转型试验	052
第二节 《体育评书》的解构困境	056
第三节 央视体育主播在德国和南非世界杯期间的表演性尝试	062
第四章 电视体育传播的类型重构	068
第一节 电视体育主播的角色重组境况	068
第二节 电视体育主播中的丑角化类型	076
第三节 电视体育是经典悲剧的现代形态	086
第四节 电视体育赛事传播的原型镜像	089
第五章 广播体操的文化象征意义	099
第一节 广播体操是身体的集团仪式	099
第二节 广播体操体现出整一的国家意志	110
第三节 广播体操重塑礼仪教育的符号体系	114
第四节 广播体操的社会表演属性	121
第六章 竞技体育传播促动城市进步	130
第一节 现代城市理念的基因移植	130
第二节 特区型城市的青春仪式	135
第三节 青奥会时代的南京城市图略	140
第四节 奥运主义激荡下的中国民族意志	149

第七章 武术的电视传播形态	161
第一节 电视包装难以再现武术的原生态内涵	161
第二节 武术曾经植根于神话学的传播体系	168
第三节 电视武术对传统武术的破坏性建设	173
后记	181

第一章 体育传播的权力播散

第一节 体育传播的启蒙力量

竞技体育是否具有文化品位,这个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仍充满疑问,原因在于传统学者过多地认可了体育的独立性,将其置于与德育、智育相并列的学术地位。这种划分表面上看提高了体育的地位,实际上却忽略了其文化品位,将其置入一种孤立、封闭和僵硬的存在状态,本质上仍是对体育内在价值认知的缺失,或者说仍属一种对体育的无意识的歧视。体育进入电视传播时代之后,才真正凸显了其文化性格,提升了其本来的文化品格,实现了竞技现象向大众文化领域的转型和蜕变。由于意识形态的特殊价值指向作用,中国的体育文化传播具备了引领全民族道德与信念走向的独特内涵,体育也以其获得的附加权力,散发出道德和文化扩张的能量。以竞技体育为代表的体育传播现象成了新型的文化种类,体育文化学科建立的基点则源于此。进入大众传播领域后的竞技体育绝非一种单纯的身体行为,其所蕴含的文化潜能几乎成了文明进化过程中的旗帜性品牌。

一、竞技体育在传播学领域的权力延展

中国古典体育远不及古希腊发达,呈现出先天发育不良的迹象,传统的中国体育也只能在诸如江湖社会的隐性形态里寻找栖身之所。在经学价值压倒一切的古典时期,中国的主流社会历来排斥体育,并视之为末技。备受打压的中国体育人,曾经历过两千多年的卑微境遇。但是,随着近代西方文化的渗透,奥林匹克精神全面挺进中国文化领域,以奥林匹克体育项目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其正面价值日渐显露,且逐渐担当起冲击中国传统文艺与文化形态的重任,体现出旺盛的文化活性,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占据了文艺传播的主导地位。20 世纪末与 21 世纪初,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竞技体育和其他的文艺形态出现了对同一文化轨道的竞争态势。由于电视的普及,大众媒体的重心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竞技体育终于完成了其精神的蜕变使命,递进为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有机元素,实现了其在中国两千年文化演进过程中的革命性和颠覆性跃进。竞技体育终于在 20 世纪末与 21 世纪初显现出了占据主导性话语传播空间的格局。

传播是一种权力,而为争取传播权力而展开的复合性竞争,更是人类的一种生物性本能。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其对传播权的掌控既体现在对宇宙、自身、群体、社会的理性制约层面,也表现出非理性的盲动特征。任何一种大型的文化权力移位都是技术革命状态下的产物,文化权力位移后的权力更新现象属于一种常态的社会运动形态,而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传播权力更迭现象皆在显性和隐性的状态下不断地完成。中国体育与其他文艺形态的竞争,只是新时期以来的事情。更准确地说,1977 年以后的中国,虽然说文艺与体育有统合并存的局面,而其各自内部始终存在相对的独立性,并随时准备根据自己的话语规则自行展现各自的权力维度,扩张文化话语权。

20世纪70年代末期,竞技体育的社会与文化阐释能量有限,体育对流行文化的统摄力和覆盖力也不够强大,基本上停留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以大众体育为主导的水平上,竞技体育尚未作为一种强势而独立的文化现象出现在文化领域,其影响力尚无法与其他文艺形态比肩。这个阶段竞技体育文化能量不足,其主要的原因是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弱小,而当年领导中国文化风潮的是文学和美学。体育的贫弱与文学及美学的相对发达,正应了“穷文富武”的中国俗语。客观上说,竞技体育实际上一直以奢侈性和贵族性见长。从事竞技体育首先要求从事这项职业的人必须超额地满足温饱问题并适当富裕,这一点在古今中外都是通则。竞技体育在欧美国家一度属于贵族生活的标志,体育进入大众性社群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1949年以前中国的竞技体育大多流行于上海、天津、广州等欧化城市的富人家族里。1977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中国笼罩于相对贫困的经济状况之下,这便直接导致了我国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价值的双重冷却。1966至1976年,中国人大多生存在准军事化生活的境遇中,这种生存方式所追求的勇敢的献身精神以及提倡身体活力的释放不仅显示了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也成为当时最具标志性的身体行为。

1977年过后的最初若干年,人性的复活促使了人道主义思想的升温,受到人性复原体系辐射的普通中国人,其人格观念逐渐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但是,因为革命化思想始终呈现单一灌输的镜像,民众尚难区分武斗和竞技的本质性差异,民众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战争思维状态下无法彻底接受完整的西方竞技体育思想。在摆脱了1966至1976年新神权主义的洗脑生活后,国人逐渐明白,放弃非竞技体育式的原始野蛮性的武斗,公平地参与竞赛而非带有先天等级歧视眼光蔑视、虐待他人取乐,反倒可以从容不迫地回到理性社会的形态。从文化角度看,1966至1976年的问题虽然是难以言说的国家耻辱,却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过滤器。丧失了公平性的身体对抗,仅仅可以体现肉搏性内耗,而无法找到解救全人类的钥匙,更看不到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总而言之,武斗不是体育,武斗的普及不仅于国无补,只会伤害国家元气,惊动民众精神,戕害国人灵魂。1960至1970年代,饥饿或准饥饿状态时常成为国人所熟悉的生存感受,国人体内最缺少的是脂肪和蛋白质,这直接导致了健身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双重的贫困化。处于生长发育期的中国青年人,在一种近乎神秘与诡异思想的支配下,充满了无端的愤怒,曾经以身体体验的冲动方式冲向了他们原以为长满了封资修毒草的文化领域。1966至1976年,那年代的中国青年几乎无法接触到竞技体育的精神,以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为代表的青少年,其尚好武斗的风范在有意无意间将身体的攻击性冲动改造成为无端地虐待他人的做派,于是,一种原属高贵美好的竞技性身体对抗体验过程终于转变成了废黜体育道德、传统品德以及国家公德的现象。1966至1976年的知识青年对体育的诠释是自发而原始的,带有动物形态学观念的生命冲动。中国的竞技体育在经历了多重曲折后,被所谓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以及其他适龄青年再度做出了错位性诠释。

竞技体育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便会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1977年以后,参与过非理性身体体验的部分中国青年深度错位的心灵迫切需要强力矫正。原先曾经做过原始兽道主义事件的知识青年和都市少年,在人道主义精神的呼唤下,恰恰是在观看电台和电视转播的竞技体育赛事的过程中第一次接触到了公平竞赛的理性主义思想,并进而接受了人类自然良知的诱惑。客观地讲,陈独秀所讲的兽道主义在“文革”中只是得到了原始性的再现,以武斗为标志的历史正是中国蛮性化兽道主义粗暴流行的年代,而任何丧失公德心和法治精神的蛮性化行为皆可视为竞技体育的天敌。新时期以来,体育社会学者多次提到的兽道主义理

想,并非以1966至1976年不良青年的横行不法行为为注脚。

即便是蛮性行为本身也有发育、发展的极限。197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全国性武斗昭彰的恶名,国人在尚未完全接受公平竞技思想的短暂时光里,依然做出了一种反武斗的文化抉择,中国的兽道主义在良心至上主义思想的引导下率先退化。应当说,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人性化理想都与兽道主义距离遥远,理性对恶的钳制始终体现文明的本质。1966至1976年特殊时期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大规模身体性武斗的结束,其直接的后果自然是对文化的饥渴性需求。反武斗的文化选择将崇尚智慧作为唯一的时尚。于是,阅读与学文化,诵诗与观览小说,就成为当时超越一切时尚之上的时尚。当年的中国人几乎只拥有一个相同的主题——阅读,阅读是反抗身体体验的,但是,阅读带给了人们更多的安静感。过多非理性的身体攻击行为曾经给参与者带来了持久不安的心理,人们渴望在阅读中抚慰自己的创伤记忆,矫正自身的不良心态,安抚自己一度翻滚无定的灵魂,寻找国家动荡的根由。20世纪70年代最后的3年,非身体性的运动性和竞技性的阅读生活就成了风靡全中国的唯一主题。引导当年时尚潮流的人物不是武装斗士,也非体育健儿和港台明星、流行歌手,而是那些发奋阅读并借以弥补蹉跎岁月的有志青年。

10年压抑导致了10年反弹。中国历史上声势浩大的阅读风潮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性运动和宗教性狂潮,并造就了新一轮的膜拜知识、敬奉文学和思想的社会浪潮。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的早期,以文学、美学和哲学为代表的文化形态逐渐击败各类文化品类,成了那个时代占有统治地位的信念性力量,纯然的竞技体育仅仅是随后跟进的文化品类。

二、竞技体育的影像启蒙

从动荡中走出的国人在回忆中找到了温馨感。回顾历史不仅可以满足人类怀旧的需求,更是人类反观自身现实处境的最佳机遇。不得不提到1981年度的中国女排事件,那是中国竞技体育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象征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当年的中国女子国家排球队在日本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但是,女排事件远非一般竞技体育赛事可比,当年的赛事有国家电视台的现场转播,许多高等院校的相关部门都安排了大学生的观看活动。可以说,当年的赛事转播事件本身意味深长,具有超越体育的社会性价值。

女排事件初步展示了竞技体育传播的跨文化力量。女排事件后,中国人调整并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历史观,并有效地缩短了国人的人性复苏周期。正是类似女排事件这样的竞技体育赛事的大范围转播现象,帮助国人几乎在一瞬间恢复了人性的自然性,中国人自豪感的复苏随即带动出一种非阅读的自然启蒙。而发人深省的是,完成这种自然启蒙的竟然是单项的竞技体育项目的传播。可以认为,1949年是中国人安逸和兴奋的时期,1958年是中国人狂热幻想的年代,1966年是中国人狂欢放浪的岁月,20世纪80年代却是中国人人性复苏的时代。由于各种文化传播形态的介入,1981年的女排事件已完全超越了体育本身的范畴,成了那个时代的国家隐喻。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尚处于浮动状态且充满了变数。为了新时代的全民性启蒙,新锐思想家们不仅将矛头对准了中国文化的根本,还对传统意识形态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文教普及的尚文型文化和自然美好的健朗型文化形成了两种文化力量,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悄然萌显的两种文化潮流。两种文化所构成的文明合力很快演化成为传播学形态的思想性与动感性文化权力,并对全社会的文化平衡形成冲力。

竞技体育虽说是一种良性文化体系中的暴力现象,但它毕竟宽容了由人类的身体所散发出的自然攻击特性,竞技体育之所以在帝制时期的中国长期遭受精英集团的歧视与压制,即在于其内含的怪力乱神的内涵。中国竞技体育在国际舞台的初露端倪,立即引来了以大学生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的猛然响应,竞技体育为传统精英社会接纳的现象几乎在一夜之间得以完成。20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遏止竞技体育的传播潮流。伴随文化启蒙潮而进入传播领域的竞技体育,并未掩饰其迥异于其他文艺形态的内在素质,却在顺理成章的条件下完成了占领文化传播领域制高点的历史性任务。正是竞技体育作为文化产品所具备的独一无二的特质,决定了其在大众传播领域强大的拓进与竞争能量。

整个20世纪80年代,竞技体育与其他文艺形态争夺文化传播空间的过程呈胶着态势,双方各自推出了一大批强力人物,而且竞争双方的人员数量、品质和影响力都呈现出一种均势。

文化的阵容以诗歌为最高级。这里不妨举出北岛、舒婷、顾城。北岛的诗风猛烈,凄怆中带有困惑的哀鸣。舒婷的诗很舒缓,假如考虑到她的女性视野,其诗歌也以野性奔放见长。顾城的诗,似乎远远比不上他的死亡选择那么名声昭彰。其实,顾城的诗,是以技术性强和人性错位、思维荒诞取胜的,他的诗风更接近排球和乒乓球球球手之类的技艺。同样的文化级别,体育中有郎平、李宁、张蓉芳。郎平的传播学形象在压抑过久的中国人心目中显然很高大,而且,由于女排事件的持久性社会扩张作用,郎平的形象在当年中国人的感知体系中已经成了一个象征性符号,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郎平已然超越了普通人的社会高度,成为一种时代的精神偶像。出体操专业的李宁,同样由于其在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时代强人的化身,其矫健的形象令人想起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传奇英雄孙悟空,具有反抗一切暴力压抑的超凡的爆发力。女排明星张蓉芳在电视观众面前展示出的变线扣杀的传播学镜像,同样已成为那个时代经典的动感象征。

20世纪80年代,体育和文艺领域均涌现出了众多别具影响力的选手。体育界的朱建华、王涛、吕琳、马文革、汪嘉伟、赵达裕、迟尚斌、容志行、朱建华、陈龙灿、管建华、许海峰、何智丽、曹燕华、童飞、楼云、江嘉良等,构成了那个时代影响巨大的传播学中的偶像群体。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竞技体育的风云人物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系列化和类型化的倾向,并与古典的文化中注入关公、岳飞、樊梨花、穆桂英等传奇人物对应相承,体现了中国民间性尚武文化固有的根性发育能量。竞技体育和其他文艺形态的共同兴盛并非偶然,它是特殊时代给予中国的一种文化复兴的现象。文武之道,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呈现了一种文化空间内体育和其他文艺形态相互对抗又相互促进、相互竞争又相互砥砺的文化平衡势态。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体育与其他文艺形态的较量,已经具备了特殊的文化意义,两者共同为的是争夺信仰空间、时尚重心、话语权力、精神的垄断与释放权力。

三、体育与电影的良性互动

体育和文艺的竞争,唯一得到和解的是电影,传统武术和武侠文学的结合成就了武侠电影。1980年,中国内地拍摄了第一部武打电影《神秘的大佛》,导演是张华勋。电影讲述的是么哥女儿梦婕,从小跟随前辈习练武艺,长大后成为保护国宝的女侠客。梦婕为报父仇打进沙驼爷家,却在暗中保护司徒骏。影片的结尾部分设立了一场武戏,借以展开正与邪之间

的决战,这是新时期中国大陆拍摄的第一部带有武打动作的影片。1981年,电影《海囚》描述了华工举行的海上暴动,影片中的武术教练是曾谋尧。1982年后,中国电影进入到了武打电影的高潮。电影《少林寺》一经播出,便成了中国流行文化的关注焦点。不少年轻观众受到了这部武打电影的影响,不惜放弃原来的世界观,如同朝圣一般走向了操场、丛林,心仪荒郊、古庙,练拳习武,更有甚者,千里迢迢跑到河南登封的少林寺拜师学艺,开始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灵肉修炼事业。电影《少林寺》的主题曲一度成为流行歌曲。

《少林寺》是一部由香港导演张鑫炎执导的商业性武打影片,由于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造势作用,一部电影竟掀起了一场在中国大陆持续多年的武术狂潮。主演觉远的原北京武术队运动员李连杰从此成为电影明星。同时,于海的螳螂拳、于承惠的醉剑、计春华的秃鹰造型,都曾经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1983年,张华勋执导了电影《武林志》,影片特邀河北省武术队加盟助阵,武打动作已经成为这部影片的基本叙事内容。同年,导演孙沙执导了他的首部武侠电影《武当》,影片将民族主义推到了前景,不再表达江湖恩怨,而是强调国家和国家、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矛盾,电影描写了5名日本武士在中州摆擂,声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江城武当掌门人陈伟为了保全武术名分和民族气节,奔赴中州打擂台,击败了日本武士,而终被对手暗害。陈伟的弟子武云龙与陈伟女儿陈雪娇同往中州,与日本武士及汉奸雷华采展开搏斗。影片主演林泉、赵长军都是武术行家,影片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国家专业队的运动员、教练员不再作为一种单纯的体育健将出现在赛场上,而是以电影人的新角色出席了中国电影文化的建设。1983年的《少林寺弟子》显然是企图借助《少林寺》的市场效应而拍摄的另一部少林寺系列电影,影片用的是《少林寺》的原班人马,但由于武打、叙事、画面感等方面都缺乏足够的创造力,并未获得理想的效果。

1984年,香港导演徐小明到内地拍摄电影《木棉袈裟》,影片讲述的是明朝末年的一个官逼民反的故事。影片的武术成分依然很大。徐小明本是《霍元甲》的主演之一,本身精通武功,影片的主演于荣光也是曾经学习过戏曲武功的小生演员。同年,南海影业公司和香港乐丰影业公司合作拍摄的《南拳王》以太平天国为背景,其正面形象来自民间戏班的艺人和南少林的僧人。影片塑造的“南拳王”由大陆南拳冠军邱建国扮演。电影的结尾很有新意,南拳王以“反旋风回力腿”击败了哈尔蚩的“折骨旋风腿”,具有极强的动作感。电影还充分运用了民间体育因素,其中引进了赛龙舟,也是借用民俗奇观来增加电影观赏性的尝试。1985年,大陆生产的武侠电影共4部,1986年增为6部,其中仅以张子恩任导演的《神鞭》在思想性和娱乐性上向前推进了一步。1987年,大陆拍摄武打片5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由张鑫炎和张子恩联合执导的《黄河大侠》。黄河大侠马义由在《少林寺》中扮演过王仁则的剑术大师于承惠出演。这部戏虽然在场面和情节上进行了大胆尝试,但仍未达到当年《少林寺》的高度,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影片没有注入言情成色,使得武打过于猛烈,失去了电影情节固有的均衡感和对电影婉约要素的合理吸纳。1988年,大陆拍摄了8部武打片,均无重大成就。1989年,中国大陆拍摄武打片11部,仅以张艺谋的《古今大战秦俑情》在画面感方面有新的尝试,香港动作导演程小东参与了影片的武打设计,但影片整体尚无突破性成绩。总之,80年代中国大陆和港台生产的武打电影充分诠释了中国功夫的当代价值,武打影片以其特有的东方动作美学和精神内涵,影响力波及大江南北。

1990年,大陆生产武打片3部,其中最出色的是何平执导的《双旗镇刀客》,严格地讲,《双旗镇刀客》不能算作武打片,而应当列入中国式西部片系列。影片中没有出现动作明星,

也没有职业武师或专业武术健将参与。但是,导演充分利用了观众心理和视觉上的误区,营造了一种既真实又虚幻的影像效果。何平借鉴了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罗生门》叙事技巧,吸纳了美国西部影片的背景处理方法,又注入了苍凉的大陆西部生活实情,制造出了一种亦真亦幻的电影效应。1991年,大陆的武打片共4部。1993年猛增到23部,其中,香港导演袁家班和徐克的加盟,为当年的武打片造出了巨大声势。《武状元苏乞儿》、《青蛇》、《白蛇传》都是经典。值得一提的是,徐克的《青蛇》、《白蛇传》,袁和平兄弟的《武状元苏乞儿》、《英雄豪杰之苏乞儿》都充分借鉴了京剧、昆曲武打的精华,而非从武术演技中吸收营养,充分地柔化了武打片的动作节奏^①。

电影和武术的婚合,酿造出了武打影片。艺术与动作的组合也连通了竞技体育。80年代中期,竞技体育带着武打电影的余威,逐渐压倒其他文艺形态的影响力,尤其是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更为深远。这个时期的体育还仅仅是对文化解释权的一种简单的介入,由于电视的不够普及,这种介入未能触及其他文艺形态的话语权本体。然而,对普通的民众来说,竞技体育的价值首先以其拥有一批清新亮丽的竞技者形象而逐渐占据了大众娱乐空间的一部分。在一个传播途径并不均衡的年代,普通民众很难完全理解体育与文艺的本然价值。竞技体育优越于其他文艺形态的地方是,它借助影像向社会大众直观地传达了体育人健美的人体、健康的仪表以及自然而又自由的肢体语言。体育人形象实际上代替了中国10年文革强烈批判小资产阶级情调风潮过后的社会性仪态美学的缺陷。当年的拳击明星阿里,稍后出现的短跑明星刘易斯,都向人们直观地诠释了作为运动家的出色仪态。风度翩翩的体育人具有传统文化人所根本就不具备的单纯、爽朗、优雅、矫健的美。电视传播领域里的体育人所透露出的高贵与体面的气质,成为一代人心目中心仪的时尚。比较古典时期以衣冠代表身份的现象,影像传媒中以身体仪态见长的体育人更接近一种自然人,他们属于大自然的子民,其奔放狂野又处乱不惊的良好素质,给正在全方位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国观众带来了具体可感的偶像群体。体育人的风采带给广大观众身体的美感,而竞技体育的各种颁奖仪式也是有史以来体育人以绝对主力身份登上中国历史最高仪态高度的标志。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体育更改了中国人性复苏的程序,缔造出一种全新的感性化的生存情态。不仅如此,体育还以其动感的形态和强大的大众传媒推动力,进而凝成了一种影响巨大的类似宗教运动的信仰变革潮流。人们渐渐期盼体育与其他文艺形态更为深远的婚合状态,能给中国这块古老土地带来更多的神奇记忆。

1987年同样是体育和文艺充分结合的年份。正是那一年,体育与文艺的力量重新组合,并在影像传播学的领域展现出既有的影响力。1987年度,中国的文化大事当属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获得了德国的金熊奖。以主流思想为坐标来观察,影片《红高粱》描述的是一种另类人的别样生活,即所谓的野蛮的人生、人之为人的野蛮性以及人之为兽的原始本能。人类野蛮的杀性与兽性、蒙昧未开的生殖力和与生俱来的劣根性都在影片中得到了极大地张扬和阐释。影片一反文革电影惯常以超人形象为主角的运作模式,将人类的兽性灌注到各派力量,实现了对文革电影规则的极端性反动。《红高粱》绝对陌生化了现实世界,虚拟出了一种野蛮的假象,它预示了这样的结局,中国人好像根本就与1966至1976年的世界没有丝毫的联系。《红高粱》所反映的狂欢与动感的精神,性爱与酒神的理想,超越意识形态

^① 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108-168页。

成见的普遍的人道价值,疏通了电影与竞技体育赛事转播画面的基本流程。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的大众影像艺术走向了隐性的衰落,而武侠电影则以其得以沟通体育精神勃发的内在推动力量占据了文学退潮后的广阔空间。原先体育和其他文艺形态尚可寻找到张扬野蛮人性的共同主题,但是,这种主题却面临着另一种强有力的隐性主题的竞争。于是,揄扬人类野蛮意志的各种视觉艺术形态终于结束了其既定的历史使命。

简而言之,在20世纪之末的最后20年,以电视传媒为主体的中国文艺和体育传播实体共同完成了真正的文艺理想与真正的体育精神的高度融合使命。1977至1989年,艺术的意义和体育的意义都在寻觅机会释放自己内在的文化密码,体育和文艺都通过新视觉革命带来的便利条件寻找到了剧烈的扩张机遇,而艺术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遏制的同时,体育却趁机迈进了主体艺术的行列。体育借助外部的力量和内在的质素,进而占据了中国文化的制高点。文艺启蒙时代的结束,隐含有电视和视频体育风行时代的到来,中国文化从此步入一种体育启蒙的特殊规程。

第二节 体育在影像时代的权力承续

1988至1997年是中国竞技体育的特殊时期。在这10年间,中国的竞技体育在举国体制的支撑下初步达到了全球领先的地位;而北京奥运会申办未果,使得竞技体育受众未曾彻底摆脱集团性焦虑状态。技术的更新和社会性读图审美的需求迫使纸质媒介的传播能量受挫,中国的电视体育取得了捷足先登的传播学优势。电视体育在传播的同时得到了更大的权力空间,而电视体育的文化内涵也出现了和新时期前期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然而,由于竞技体育与现实性日常生活的距离相对拉大,加之竞技体育在传播学领域侵占阅读传播的领域过大,体育传播很快抵达观众审美疲劳的极点从而遭受到社会性冷落,同时还引发了阅读行为与体育竞赛在传播学领域的对抗。体育传播面临新的境遇和机遇,而其文化的内涵亦在发生微妙的蜕变。

一、两种传播主体的内部竞争

通俗文化有一种特别的规律,越是通俗的文化种类就越是靠近动物甚至低级动物的状态。人类的文化形态最高级的是哲学,其次是艺术学,再次是文字组成的文学,以下依次是动作性的舞蹈和竞技体育以及纯声响性的音乐。人类最低级的艺术形态是音乐和体育,因为高级灵长类动物也能够看得懂足球;兽类、禽类、鼠类、昆虫也能够听得懂音乐。所谓通俗文化,即靠近低等级动物欣赏与接受能力范围的文化,越接近低级别动物感知能力的文化,就越是通俗文化。文学较诸科学、哲学或许很感性,但较诸体育,阅读性文化就显得过于抽象艰深,晦涩枯燥,高深莫测,曲高和寡,缺少质感。中国的阅读性文化赋予了中国人以自由,也同样送给了人们一种繁难复杂、望而生畏的认知客体,因为犬类动物从来看不懂《红楼梦》,而大型猫科和犬科动物却很轻易地看懂足球,并且见到滚动的足球就想起了追逐,从而体验追逐的乐趣。昆虫不仅爱听音乐,还可以娴熟地沿着音乐的足迹寻找爱情。

纸质媒体的相对衰落带来了传播学界的革命,并为竞技体育的流播注入了活力。作为

读图时代主流审美对象的体育从此确立了观赏艺术的天然品阶。观赏和阅读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观赏者在欣赏过程中只需要动用人类的本能。具体而论,观赏过程仅仅需要小脑即可应付,而阅读活动就不仅需要动用眼睛扫描,还需要运用大脑频繁地在各个神经组织之间传输代码、编织图像、输送信号,并需经过大脑等诸多复杂器官的联合处理才可达到终极的目的。比如,先把文字转化成形象,再动用各种感官综合加工,最后才能完成新的形象设计。但是,体育就远没有那么繁琐。体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超人类的,具有泛生物的特征,可沟通人与动物的共同兴奋本能,是人类以及所有较高档次动物的共同兴趣点。如孟加拉虎见了奔跑着的野生水鹿,马上反射的就是60米冲刺,20米内利爪见红。相反,羚羊看到狮子或者猎豹,马上的反射即是200米加速跑,而且100米处的弯道技术以及变速跑、折返跑的技术一定要过硬,否则就要奉献生命。动物的运动之美,对动物本身来说仅仅是求生之需,并无格外的审美价值,但对人类来说,却是极为珍贵的美学参照对象。当今电视中处于极高收视率状态的《动物世界》类节目和竞技体育具有同频共振的收视效果,原因即在于此。观赏行为是人类和动物最自由舒展的休闲方式,而阅读就难免背上一种沉重的十字架。

阅读和观赏的分水岭十分明晰,就欣赏接收者的心理感应而言,两者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可以认为,如果说观赏是一种自由漫步的话,那么阅读则是一种戴着脚镣的跳舞。观赏是一种贫民艺术,而阅读则堪称一种贵族的玩具。观赏决定了世界上感性文化浪潮与活力,阅读则一直延续对古典价值的祭奠与怀旧情结。不可否认也始料不及的是,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面临着这样一种文明的挑战与抉择。由于人类对观赏权力的渴望冲动,导致了一场文化传播的竞争。

20世纪70年代早期至80年代初期,中国人热爱阅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阅读热没有迅速地降温与衰退,是因为它延续了1966至1976年思想禁锢之后灵魂解冻与解放的双重驱动力,全国上下似乎有一种格外不为人注目的力量,驱动着人们走向书籍的海洋。阅读者群体对阅读的冲动正是顺应了这样的文化惯性而为人纪念,阅读活动与竞技现象所营造出的文化传播领域的均势,则为新时期文化启蒙运动的基本格局,也是新时期文化启蒙区别于“五四”文化启蒙的地方。新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以竞技体育为崭新元素,则为“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家所难以想象。

20世纪80年代后期竞技体育的传播力度很强劲。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中国夺得5枚金牌。国家投入如此人力物力智力财力,获得如此稀少金牌,却是上上下下的中国人不愿意见到的。但是,恰是传播导致了民间性争议,催化出完全对立的多元性观点。1988年的中国文学有史以来第一次站到体育的反面,展开了对竞技体育的全面声讨。一时间,文学竟成了为竞技体育临时搭建的审判台。其中,赵瑜的《强国梦》和《兵败汉城》像两件重型武器,企图剥蚀中国竞技体育的神圣光环。这两篇报告文学,矛头直指中国体育的最大造神机器——当年的国家体育委员会。

中国的奥运争光战略历来属于政治任务,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色。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曾说:“意识形态被视为一种‘社会胶合剂’,而大众传播则被看作一种涂抹粘胶的特别有效的机制。”^①由于政治任务和传播任务的双重失利,中国体育人处境艰难。在如此文学精神的比照之下,即使像奥运会金牌获得者,也统统变成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半拉子人,中

① [英]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铨等译,上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3页。

国体育再度没落到传统体育人所熟悉的经典的卑微境地。文学家眼中的体育人成了颓废麻木且受人操纵而又精神畸形、灵魂空洞的动作机器,而国家以无数体育人的命运毁灭换取的少量金牌皆显得有失体面,少量的金牌数在巨额的财政投入的对比下,失去了既有的价值。文学人坚信,国家超量的巨大投入,换来的仅是几枚内涵缺失的稀有金属制造的牌状物而已;文学人进而认为,国家以脆弱的体育机器支撑的仅是虚幻的强国梦想。1988年,中国体育不仅奥运金牌战略受到重创,还遭受了国人近乎苛刻的粗暴对待,其尴尬境遇再度说明,体育人摆脱妖魔化境遇的时间仍很漫长且时有反复的风险。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岁月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时代,人们的精神空间再度陷入短暂的虚空状态。表面上看,体育与文学的冲突是价值观和启蒙思想分歧的内部性竞争,其实,掩盖于表象之内的则是双方对传统传播空间的竞争。文学从讴歌体育到蔑视体育的转化,实质上仍是两者在新时期文化传播权力重新划分过程中的必然性对抗。文学的竞争力和体育的竞争力一旦遇到相同的权力空间,必然要迸发剧烈的冲突。文学和体育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更,文学可以拯救体育,而体育同样可以拯救文学,文化的传播有竞争必有重组,而1988年的中国体育首先要面临的是拯救或自救,而非济世与启蒙。

1988至1991年,拯救中国竞技体育的力量适时出现。这种拯救体育的力量并非体育本身,而是其他文艺形态的整体性失语与没落现象。同期,中国其他文艺形态的相对落寞则成了体育挺进传播空间核心地域的绝佳机遇。只要了解同期中国其他文艺形态的日渐逼仄的处境,就会发现竞技体育恰是在这个时期担当起文化启蒙的主力军重任。文艺的整体批判力下降,使得文艺的柔性活力泛滥,其生长性和生命活力受到遏制,中国文艺重新回归到类似20世纪20至4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的时代,甚至远不如那个时代的文艺水准,具有纯正的东方性和地道的民族风格的缺失,使得这一时期的文艺呈现出滑出中国文艺既有轨道的态势。恰是文艺的逍遥化、虚无化和边缘化处境贬低了中国文艺自身的存在价值,亦为体育启蒙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体育启蒙的优势很明显,简单的竞技成绩即可在瞬间完成传播权威鼓动的功能。1992年度的中国体育人,随着巴塞罗那奥运会金牌数猛增,一时又恢复了久违的自信心;中国竞技体育不仅元气开始恢复,还一举夺回了由其他文艺形态把持良久的文化传播学权杖。这一时期,另外一种堪称重大的文化变革正在悄悄地发生,那就是电视机的普及。电视机的普遍降价远远超越了技术和商业的层面,它同样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变革,甚至是中国文化权力位移和颠覆的革命性转折点。体育与其他文艺形态争夺权力空间,逐渐变成了两者对电视权力的反复控制过程。如果没有电视的介入,20世纪80至90年代的体育热也将失去真实的依托。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人们谈论良久的所谓体育,几乎就是电视传播画面里的体育;民众所获得的体育信息和力感鼓动,也绝大部分来自电视;人们看到的体育比赛镜像多是电视的影像;人们阐释的体育文化,准确的说法就是电视中体育影像中的文化。

正是电视传播画面中的所传输的优雅体育明星形象让人们想到了体育与文艺在商品经济时代到来后的魅力比照。体育在技术的映衬下逐渐变得比其他文艺形态更为重要,最显见的例证是,中国有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却没有类似规模的文艺竞赛委员会。世界上有奥运会,却同样没有同等规格的文艺家竞技盛会。即便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颁奖活动,仍无法抗衡奥运会盛典和世界杯足球的巨大影响力。从前由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共同

承担的解放人类内心困惑的任务,如今则被竞技体育夺去了部分功能。诗学曾经拥有过的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却无以抵挡由体育锻造民族精神感性标志的传播学力量。古典时期人类的最佳抒情方式是诗歌,而现代社会的抒情语汇则为竞技体育。由于传播媒介的革命,体育已是现代文明的主流载体,其哺育人类精神和改良众生灵魂的价值日渐显赫,技术的进步使得竞技体育在传播学领域取得了文化层面上的显在优势。

二、文化暴力形态的重组

把世纪更迭时代的文化格局简单地定位为竞技体育一统天下,还显得过于草率。1994年理应是中国体育向中国其他文艺形态发动继续革命运动的时间,那年最大的体育事件便是中国足球开始了其漫长而坎坷的职业化之旅。足球职业化之路的启动,本质上是一场利益重新分割、财富急剧转移、财产急速分流、势力重新调配、格局重新洗牌的文化和商业巨变运动,它有效地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生态平衡。严格地讲,那还不是改革,而是一场文化裂变运动,也是一种极为刺激的多元的社会戏剧,它一度是一场未完成的文化悲剧。任何革命都必然会对一部分人带来不适感。体育占据国家文化权威地位的事实,无疑给传统的儒学教化的文明体系形成剧烈的冲击,文明破裂的担忧开始出现在当代人的视野,因为所谓的职业化足球就是商业足球,许多赶不上商业足球时代的退役球员首先发出了生不逢时的感叹,从而陷入一种精神的困境;许多文化人早已接受了长达两千年的士人文化一统天下以及文官制度的绝对合理性格局,对体育人成为国家传播媒介的主角难以适应。“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真理般的传统价值观几乎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中国体育文化长期以来极为稳定的天平不复存在。

说到底,中国足球体制的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改革,完全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商业革命的产物,是世界资本一体化的必然催化物,也是中国各方人士力图恢复大国地位急迫心态在体育界的体现。唯一能够证明竞技体育和平崛起合理性的力量则是“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强力思想和浪漫主义的狂飙突进的精神,那曾经是鲁迅、毛泽东、雷海宗、陈铨等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为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足球革命提供了参照的工具。当年的文化革命旗手鲁迅是站在歧视中国武术的立场上树立起启蒙旗帜的,而体育人用真实的足球语汇阐释商业时代到来后文化权力的重新分裂,则是对鲁迅时代用语言宣传强力思想的新奇补充。体育用体制操纵权力,却在特殊的时代夹缝里寻觅到了符合自身健康生长的理想空间。

真实的金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而务虚的偶像也无法出现真空。还得提到鲁迅。整个20世纪60至70年代,鲁迅作为新的传播学偶像,一度是中国大陆民众的精神和信仰领袖。20世纪80年代后,鲁迅的偶像地位下降。鲁迅淡出神坛,中国人又陷入一种失去神灵依靠后的空虚与虚无之境,只好为中国只出了一个神话般的鲁迅而扼腕长叹。20世纪90年代,当人们再次谈论鲁迅的时候,谈到的竟然是鲁迅当年的经济收入。当年的鲁迅,卖文为生,其月薪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人民币1万多块钱的购买力。鲁迅终其一生,仅仅凭借稿费和版税收入,按照20世纪90年代购买力单位计算,大约折合人民币400万元。曾几何时,中国文化人愕然长叹。当年的鲁迅,没有投靠青洪帮,没有求取高官厚禄,却可以在北平买下四合院,在上海买下了现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的一幢公寓。数据显示,1919年,鲁迅